

近代国家
与社会丛书

戴斌武◎著

笔尖下的 近代中国历史断面



BIJIAN XIA DE
JINDAI ZHONGGUO LISHI
DUANMIAN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HEFEI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PRESS

苏州大学中国史重点学科建设经费资助出版

笔尖下的近代中国历史断面

戴斌武 著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笔尖下的近代中国历史断面/戴斌武著. —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2013. 9

(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

ISBN 978-7-5650-1458-1

I. ①笔… II. ①戴… III. ①中国历史—近代史—文集 IV. ①K250.7-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89222 号



笔尖下的近代中国历史断面

戴斌武 著

责任编辑 章 建

出 版 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合肥市屯溪路 193 号
邮 编 230009
电 话 总 编 室:0551—62903038
市场营销部:0551—62903198
网 址 www.hfutpress.com.cn
E-mail hfutpress@163.com

版 次 2013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毫米×1010 毫米 1/16
印 张 18
字 数 325 千字
印 刷 合肥学苑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全国新华书店

ISBN 978-7-5650-1458-1

定价: 40.00 元

如果有影响阅读的印装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市场营销部联系调换

《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

编 委 会

主 任 王卫平

委 员 (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卫平 王国平 王玉贵 韦 恒

卢伯炜 池子华 孙海泉 朱小田

朱从兵 余同元 陆建洪 李 峰

单 强 俞 政 黄鸿山

主 编 池子华

执 行 主 编 朱从兵

执行副主编 王玉贵 黄鸿山

总 序

《近代国家与社会丛书》为江苏省重点学科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博士学位点标志性成果之一，旨在通过对近代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思想、文化等领域重大问题的研究，揭示近代社会发展变迁的内在规定性，推进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进一步深入，为当代中国社会发展提供有益的历史借鉴。

苏州大学中国近现代史学科，自著名史学家柴德赓先生 1955 年南下创办江苏师范学院历史系以来，经段本洛、董蔡时诸前辈辛勤耕耘，奠定了较为雄厚的基础，并于 1990 年后相继被批准为博士学位授权点和江苏省重点学科。学科负责人先后为段本洛教授、王国平教授、池子华教授。本学科最初以近现代江南社会经济研究为主要方向和学科特色。为进一步适应经济与社会发展的需要，本学科的研究方向不断调整和增加，“九五”期间设有近现代江南社会经济、中国近现代政治与对外关系、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等研究方向。“十五”期间增设中国近现代社会史、中国近现代城市发展等研究方向。“十一五”期间增设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方向。

近年来，本学科出版学术专著近 50 部，代表性的著作有：《苏州手工业史》《左宗棠评传》《中国近代流民》《红十字与近代中国》《农民工与近代社会变迁》《胡林翼评传》《严复著译研究》《李鸿章与近代中国铁路》《明清时期江南城市史研究：以苏州为中心》《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保障与慈善事业研究》《当代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变迁研究》等，在《中国社会科学》（英文版）《历史研究》《社会学研究》《史学理论研究》《光明日报》《国外社会科学》《近代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等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800 余篇。研究成果多次获省部级科研奖励。

本学科多次承担国家、教育部和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研究项目。继段本洛先生于 1994 年成功申报国家社科基金重点研究课题“近代江南农村”后，又相继承担了“16—19 世纪苏州与徽州历史发展差异的比较研究”（主持人唐力行教授，现调任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农民工与社会变迁

——以近代苏南为中心”（主持人池子华教授）、“中国共产党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研究”（主持人王玉贵教授）、“近代中国‘打工妹’群体研究”（主持人池子华教授）、“清代江南地区慈善事业系谱研究”（主持人王卫平教授）、“近代江南社会保障机构的经费收支与运作研究”（主持人黄鸿山副教授）等国家社科基金项目的工作。王国平教授、朱从兵教授、余同元教授、李峰教授承担了国家“清史工程”的研究项目。此外还承担了10余项省部级社科基金项目的工作。

目前，本学科的主要研究特色为：在继续保持原有区域（江南）社会经济研究特色的基础上，在社会史研究特别是流民问题、农民工问题以及红十字运动研究等方面，在学术界产生较大影响。在铁路史、思想史特别是严复研究、社会保障、城市史、外交史特别是民间外交史的研究上，也具有一定影响，显示出良好的发展势头。

为汇聚学科特色，我们将陆续出版团队成员的最新研究成果，以推进本学科的发展更上层楼。

池子华

2010 年秋

序

斌武博士在推出《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与《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抗战救护研究》两本专著之后，又将其十余年来在国内学术期刊公开发表的论文加以整理，根据论文的性质，归为近代人物研究、社会经济研究、思想文化研究与红十字运动研究等四个专题，命名为《笔尖下的近代中国历史断面》。斌武在其论文集即将出版之际，多次嘱我撰写序言。作为斌武工作上的同事与挚友，我自然为他在学术道路上取得的点滴成绩与进步感到由衷的高兴。这本论文集是作者对自己从事史学研究以来的一个总结和交代，亦是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的成果，值得我们庆贺！

斌武籍隶湖南新化，出生农家，聪颖睿智，勤奋好学，善于独立思考，1998年以优异成绩考入贵州师范大学历史研究所，师从著名历史学家吴雁南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硕士学位，奠定了较为扎实的学术功底。此间，斌武主要以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地方督抚丁宝桢为研究课题，被贵州史学界称为“丁宝桢研究专家”。2005年他又考入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师从陈廷湘教授攻读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毕业后进入苏州大学社会学院历史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师从红十字运动研究领域资深专家池子华教授做博士后研究工作。斌武在攻读博士学位及从事博士后研究工作期间，主要以抗战时期的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为研究课题，在该研究领域已有所建树，并已出版两本学术专著。

斌武于2001年硕士毕业后投笔从戎，在武警贵阳指挥学院担任政治理论教官期间，亦勤于笔耕，在思想文化方面颇下功力，撰写并发表了系列相关论文，并把研究视野拓展至社会经济领域。2008年，由于工作需要，斌武被调入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部，担任秘书并负责总队军事理论课题研究，在《武警军事》《武警学术》《武警政工》《军事历史》《人民武警报》《解放军报》发表军事理论学术论文20余篇。正如武警贵州省总队副总队长李儒义大校在为作者《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研究》一书所做的序言中提及：

“斌武博士是武警贵州省总队司令部的一名中校警官，也是一名青年才俊，论述颇丰。”

2012年，斌武退出现役转业至贵州省水利水电工程移民局工作，研究领域与研究旨趣有所调整 and 改变。工程移民作为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为一体的交叉学科，尚未形成一门相对成熟的理论体系。我希望斌武继续保持勤学善思、勇于探索的学术品质，期待他在水利水电工程移民理论与实践研究领域有所建树和突破。

“初生之物，其形必丑。”对于一位具有开拓性的青年学人而言，历史学研究领域论文的结集出版只是作者前一阶段学术研究的回报，后面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还有更多的移民理论研究领域的课题需要去攻克，从“历史”回归“现实”。历史需要历史的回答，历史需要现实的回答，历史需要未来的回答，历史更需要见证文化理想的延续与发扬。

谨以为序。

王应政

2013年6月

目 录

【近代人物研究】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晚清地方督抚	
——丁宝桢洋务活动解析	(003)
丁宝桢反教心态及范式透视	(012)
传统与现代之间的两难选择	
——丁宝桢文化性格解读	(021)
丁宝桢与近代中国国防事业	(027)
丁宝桢洋务思想初探	(041)
丁宝桢与四川盐政改革	(047)
丁宝桢与四川机器局	(054)
王阳明的经济思想	(060)
论王阳明的儿童教育思想	(062)

【社会经济研究】

民国时期贵州农村高利贷盛行原因分析	(069)
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开发西南农业的主要措施	(075)
抗战时期的贵州农村合作事业	(084)
抗日战争时期的贵州农业	(092)

【思想文化研究】

论民族文化背后的晚清乡绅社会反教情绪及表现样态	(101)
近代西南地区少数民族基督徒群体社会心态探析	(112)
义和团运动与改造中国	
——纪念义和团运动 100 周年	(121)
五四时期的科学思想	(127)
传统文化视域内的诚信道德及其现代价值	(132)
传统与现实：关于德治思想的价值诠释	(143)
传统儒家精神及其现代价值	(148)

【红十字运动研究】

论“复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的社会福利事业	(161)
抗战初期中国红十字会战地救护工作述论	(170)
红十字会救护总队与战时三合一政策	(181)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防疫工作述论	(190)
论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成立及演变	(199)
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抗战救护述论	
——以武汉广州会战时期为中心	(214)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组织结构及运作模式述论	(223)
抗战时期中国红十字会救护总队医护人员身份与待遇述论	(247)
论全面抗战前中国红十字会的救援工作与抗战救护准备	(254)
后 记	(276)



近代人物研究

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的 晚清地方督抚

——丁宝桢洋务活动解析

一

鸦片战争后，西方的器物、科学与技能的传入及随之而来的工业化、都市化、大众传播的发展，促使中国从传统社会走上了“转型期”社会^①。

丁宝桢恰好是活跃于这一社会之中的重要人物，是站在“传统—现代的连续体”之上的典型代表。他既不生活在传统世界里，也不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他既生活在传统的世界里，也生活在现代的世界里。转型期社会是“新”与“旧”的混合物，当时，中国的“信仰系统”虽遭到西方文化解构，但西方的信仰系统尚未在中国人的心里生根；中国人虽已开始欣赏西方的价值，但古老的传统价值对丁宝桢一类的人物仍有若干吸引力。作为一个过渡性人物，丁宝桢力主采西方之长以补自己之短，初步具备了洋务思想。同时，他对洋务运动这一社会主旋律的认识又不断加深，并对西方的船坚炮利有了更理性的认识，最终形成了较为完整和系统的洋务思想。具体地说，其洋务思想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采西学，制洋器，师其所长，夺其所恃的洋务自强观

同治六年（1867），丁宝桢在承认西方“火器精良，远胜于我”的前提下指出，要抵御外洋，必须“变计”“自强”，学习西方^②。在同治十年（1871）整顿山东水师时又指出，中国水师除“营制未善外”，还存在“船之不坚、炮械之不利”等严重问题，而“攻坚致远，擒斩制胜者，全恃大炮”，在枪炮以“外洋精制者为佳”的情况下，“应不惜重价，责成造船委员认真办

① 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64页。

② 丁宝桢：《密陈制夷方略》，《丁文诚公奏稿》卷四。

理”^①。光绪二年（1876），他在奏折中明白指出：“变则贵通，通乃可久。”^②“通”的目的是为了自强，自强则必须学习西方近代军事技术，制造洋枪洋船，并逐步精益求精，庶几机器精良，军储充裕，自可夺外人之长技，不致见拙于相形。……所谓自强者，于此真得实际，所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仿造洋枪洋炮是“天时人事之所趋”^③，不可不认真对待。

（二）选拔造就本国人才而不用西人

丁宝桢“性喜崇儒重道”^④，因此在重视具有西方科技知识人才的同时，他的人才观具有双重价值衡量标准，可具体概括为“才德”和“才才”两条，即所选人才必须德才兼备。德的方面除三纲五常外，还包括了不以言利为耻的内容；才的方面则要求具备察吏安民的才能，同时还应懂得机器制造，掌握枪炮使用方法，熟悉洋务。这和“中体西用”的洋务思想是合拍的，可以说是人才观上的“中体西用”。他的“才德”的标准不局限于道德修养，更看重的是能否服务于洋务事业的开展。所以他保荐人才的奏折无不首陈其德，如称四川建昌道唐炯秉性刚毅，操守谨严；称山东候补道张荫桓“为守兼优，究心事务”；称署理成都府知府王祖源“心术正大，清操自励，守正不阿”等。在“才德”并重的基础上，丁宝桢并不忽视“才才”，他认为，时值多事之秋，国家迫切需要谋略济时、学堪致用之才，人才的保荐不仅要才气深厚、“任事果决”，而且要“治事精密”“识略宏深”“治理通达”。如保举唐炯、薛福保等人时，即力陈前者“才才”，认为他“识见宏远，才气深厚，忠勇冠时”；后者则称其“才识宏通，器局渊深，见事明决”^⑤。

人才如何发挥作用呢？丁宝桢认为要因时、因人、因地发挥其才能。“因人”指知人善用，根据其特点安排合适的职位，在《调张荫桓文天骏片》中，他强调：“必得熟悉算法及深明海疆攻战情形之人，测度创造方期合法。至安设机器，亦必得谙习之员，始能成事而省费。”^⑥“因时”“因地”则指根据实情任用人才。他主张拒聘“洋员”的想法在晚清洋务思潮中则可谓独树一帜。

洋务运动时期懂得洋务的人才极为稀缺，解决办法有二：一是聘用洋匠、洋教习；二是迅速培养本国洋务人才。丁宝桢客观地分析了任用洋人的弊端：“中国自兴造机器以来，其时风气未开，多资洋人为师，此实不得不然之势。

① 丁宝桢：《整顿山东海防购造船炮折》，《丁文诚公奏稿》卷八。

② 丁宝桢：《请奖曾昭吉片》，《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二。

③ 丁宝桢：《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奏稿》卷首。

④ 丁宝桢：《山东巡抚请建祠疏》，《丁文诚公奏稿》卷首。

⑤ 丁宝桢：《保举人才堪任使折》，《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八。

⑥ 丁宝桢：《调张荫桓文天骏片》，《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七。

臣窃以为欲造机器，决不能不仿西法，而仿照西法，仅可师其法，窥其意，而决不可用其人。盖我方学彼之长，若再借彼人为王师，则西人之教法必将秘之而不能尽授，即中国人之心思，亦将狃于故常而不能通灵。”所以“决不用一洋人指示”^①。

二

丁宝桢是地方现代化领导精英中的一员，其推动中国早期现代化的活动主要是创办山东机器局和四川机器局。山东、四川两机器虽不是最早创办的，规模也不算大，却卓有成效，富有特色。

丁宝桢于19世纪60年代在奏折中就说：“臣于同治年间在东省会剿捻匪，亲历行间，所用东、淮各军，多以洋枪洋炮纵横攻击，其摧坚破敌，虽发、捻各股匪动以数十万计，每遇交锋，我军枪炮所及，莫不披靡，直、东两省遂收聚歼之功。”^② 1870年天津发生教案时，时任山东巡抚的丁宝桢更明白地指出：“切火器只须访求善式，由营自行加工制造，至火药、炮子二种，在军中尤为紧要之物，应责成该营统领督同营官等加工监制，不准草率，务使火器各项渐就精良，以收实用。”^③ 1874至1875年，日本侵犯台湾及英国侵略云南两桩事件相继发生，更使他感到筹划山东机器局刻不容缓，遂上奏朝廷：“东省现筹海防，臣定以修筑炮台与安设制造药丸及修理枪炮之机器两事为先务。”^④ 又说：“即用外洋枪炮，必需外洋子药，而内地所用皆购于外洋，为费甚巨，且恐有事之时，药丸无处购办，枪炮转为弃物。臣是以设立机器局。”^⑤

为此，丁宝桢致函北洋大臣李鸿章，商量山东机器局事宜，以后又奏请清政府派员出洋考察“各国枪炮式样”。总理衙门要他与李鸿章协商，二人除书信交换意见外，还派张荫桓到天津面询机宜。因丁宝桢在山东围剿捻军时与李鸿章早有嫌隙，而这时李鸿章又担心他占用北洋经费，故对筹办山东机器局不仅不支持，反而处处设置障碍。这在筹集经费和派员出洋考察两个问题上都有表现。1875年以来，清政府每年拨款400万两作为南北海防经费。丁宝桢认为，山东在北洋之内，因此修筑沿海炮台及建立机器局，其费用都

① 丁宝桢：《覆陈机器局暂缓开办片》，《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七。

② 丁宝桢：《机器局遵旨停止报销用款折》，《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七。

③ 丁宝桢：《整顿山东海防购造船炮折》，《丁文诚公奏稿》卷八。

④ 丁宝桢：《调张荫桓文天骏片》，《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七。

⑤ 丁宝桢：《设立机器局折》，《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二。

理应由此项专款开支。李鸿章则强调：“炮台机局，兼为筹防本省之计，于北洋大局无甚关系，自未便分用此款，致有窒碍。”在《论海防筹饷》的译署函稿中更说：“北洋所辖省份，——唯山东稍可自给。”至于修建山东机器局之事，李鸿章以后也明确表态：“必当竭诚相告，东省各库存款闻将三百万，财力大有可为。”^①驳回了丁宝桢的有关要求。在派员出洋考察问题上，李鸿章则指责丁宝桢选人不当，“东省拟派陈择辅，年老而有嗜好，固未敢信。即如温子绍、徐建寅于洋务制器稍有会心，尚虑其惮于远行，即行矣，亦未见出洋之必可得力”。又说山东机器局“开局先制火药、炮弹，购买机器，选觅中外工匠，则津、沪、宁各局皆有成式可循”。也就是说可以在上海、香港等处设法访觅订购，人工局员中尚有精核斯事者，可无须专派出洋，致添靡费。即使将来有必要出洋考察，也须谨慎而行。由于李鸿章的诘难，丁宝桢只好放弃了派员出洋考察的主张。虽得不到清政府及李鸿章的财政支持，丁宝桢为办洋务自筹资金，甚至不惜动用山东省藩库、粮道库、临清关等处款项，甚至自行筹措本省办公之款。

资金问题解决后，关于选择厂址和选用科技人才这两大问题他非常重视。最初拟设机器局于莱州后路，以后又打算建在潍（县）、昌（邑）之交的白浪河一带，最终决定设在济南北郊泺口逸东高亢之区。厂址之所以设在省城，除便于控制外，还出于以下三方面的考虑：（一）设厂内地，有利于避免外国侵略者的觊觎，“万一别有他事，仍可闭关自造，不致受制于人”。（二）附近章丘、长山等县有煤、铁、硫磺等矿，便于就地解决原料和燃料问题，“纵有闭关之时，无虞坐困”。（三）泺口北滨黄河，南临小清河，交通便利，“秦晋豫燕湘鄂各省，由黄河溯流而上，一水可通，将来制造军火有余，可借各省之用，转输易达”^②。通过小清河，机器局的产品可运往本省东部沿海，所以是“最得地势”的上乘选址^③。

科技人才之选拔是筹建山东机器局的重要一环。在他的悉心罗致下，如张荫桓、薛福辰、徐建寅、曾昭吉等洋务人才，纷纷聚集在他的麾下。为购置先进的机器设备，还在着手建厂之初，丁宝桢便派人外出购置。1876年初又派徐建寅去上海，通过英国蒲恩公司，购买可以制造洋火药和马氏尼洋枪的机器。为加快运输速度，他又特意从福建调来“万年青”号火轮专事运输，从而使山东机器局在1876年年底前就装配起来了。

① 李鸿章：《译署函稿》，《李文忠公全集》卷三。

② 丁宝桢：《机器局置器造厂规模大备折》，《丁文诚公奏稿》卷首。

③ 丁宝桢：《覆陈机器局暂缓开办片》，《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七。

山东机器局的工人数目，当时约有 250 人^①。因雇用广东工匠花费太大，故熟练技术工人改由在浙江、直隶招收，学徒工则在当地雇用，他们“相互学习，是以勤奋过于洋匠，而工资不及一半，每年节省既巨”^②。至 1876 年，机器局除生产马氏尼枪 120 余杆外，火药尚未正式投产。

1877 年 5 月，丁宝桢开始着手组建四川机器局。经费“不动正款”，主要由省内土货厘金和茶引提拨；厂址选在成都城东南的下莲池拱背桥，主要设备则派人到上海等地陆续购买，其余机械设备皆由中国技师、工人设计制造。经过一年多的筹建，四川机器局初具规模，共建大小厂房 188 间，全部仿照西式，“崇垣大柱，复屋重檐，安设铁炉、烟筒、风箱、气管，四通八达，取材既富，用工极坚”，并自行制造水轮机器，其“灵动活泼，视洋人专借火力尤事省功倍”^③。“自行造成水轮机器及各种机器共二十五部，未合成机器及工用器具等项共一万二千零六十九件，已合成前门后膛等枪共一百四十八杆，未合成洋枪共一百六十杆。”^④

四川机器局建立不久，即遭到保守官员的反对。川籍给事中吴镇参奏丁宝桢“不谙机器，私亏库款，纵容私人，徇庇劣员”^⑤。清政府只好派礼部尚书恩承、侍郎童华前往查办，结果虽然认为“原参各款，或查无实据，或事出有因”，但由于机器局“费用较巨，制造未能精良，著该督即将此局停，以节糜费”^⑥。四川机器局终于在 1879 年 5 月 10 日撤销。这引起了洋务派的不满，他们认为尽管“用费较巨”，然而事在初创，“开拓地基，修造房屋，以及搬运器械，制造母机，种种费用，俱在此六万金之内，非全以六万金造枪炮也”，“若遽行停止，则前功尽弃”^⑦。因此希望清政府重新开办。丁宝桢则不无抱怨地向朝廷申诉，“今强敌各擅长技，中国独不屑蹈袭，以为墨守故常，不难角胜，且以为可以购求于外洋，此实自欺欺人之语，同必不可得之势也”，“至近来讲求机器，实属目前之要图，然颇为众论所不许”，并对机器局的停办“深为惋惜”。清政府迫于舆论，遂于 1879 年秋发出上谕：“四川机器局应否兴办，著丁宝桢酌度办理。”^⑧准许其恢复开办，但一办一撤，损失已大。

① 孙毓棠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 1 辑下册），科学出版社 1957 年版，第 1188 页。

② 丁宝桢：《机器局用款报销折》，《丁文诚公奏稿》卷一二。

③ 丁宝桢：《调曾昭吉赴蜀片》，《丁文诚公奏稿》一二。

④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706 页。

⑤ 朱寿朋：《光绪朝东华录》（一），中华书局 1958 年版，第 706 页。

⑥ 丁宝桢：《川省设立机器局片》，《丁文诚公奏稿》卷一四。

⑦ 中国近代史丛刊编写组编：《洋务运动》，上海人民出版社 1961 年版，第 340—341 页。

⑧ 丁宝桢：《遵旨覆开机器局折》，《丁文诚公奏稿》卷二〇。